

上海市重点图书

胡雲翼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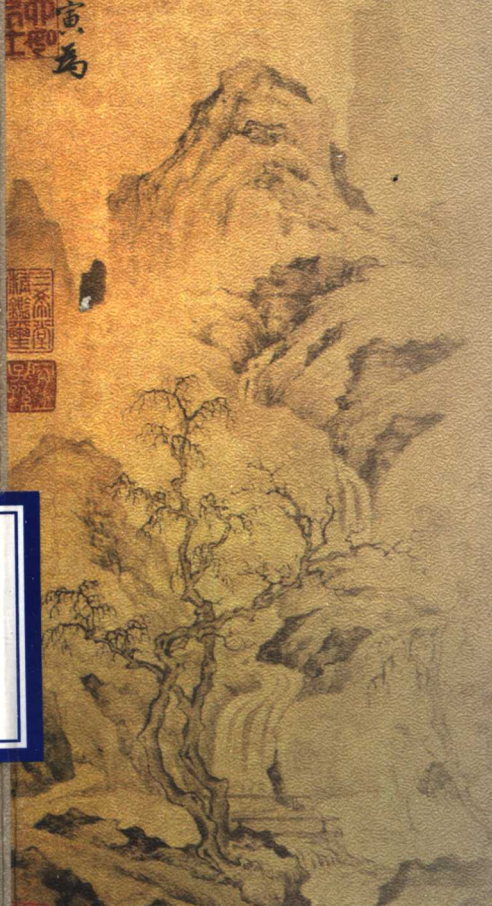
胡雲翼

胡雲翼 著
刘永翔 编
李露蕾

HUYUNYI SHUOSHI

说诗

守閨作
蘇軾唐寅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胡雲翼集

胡雲翼说诗



唐诗研究·宋诗研究·明清诗选

胡雲翼 著

刘永翔 李露蕾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雲翼说诗/胡雲翼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

ISBN 7-5617-3662-2

I. 胡… II. 胡… III. 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08778号

胡雲翼集

胡雲翼说诗

唐诗研究·宋诗研究·明清诗选

著者 胡雲翼
编者 刘永翔 李露蕾
责任编辑 刘凌
责任校对 郭绍玲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业务电话 上海地区 021-62232873
华东 中南地区 021-62458734
华北 东北地区 021-62571961
西南 西北地区 021-62232893

业务传真 021-62860410 626023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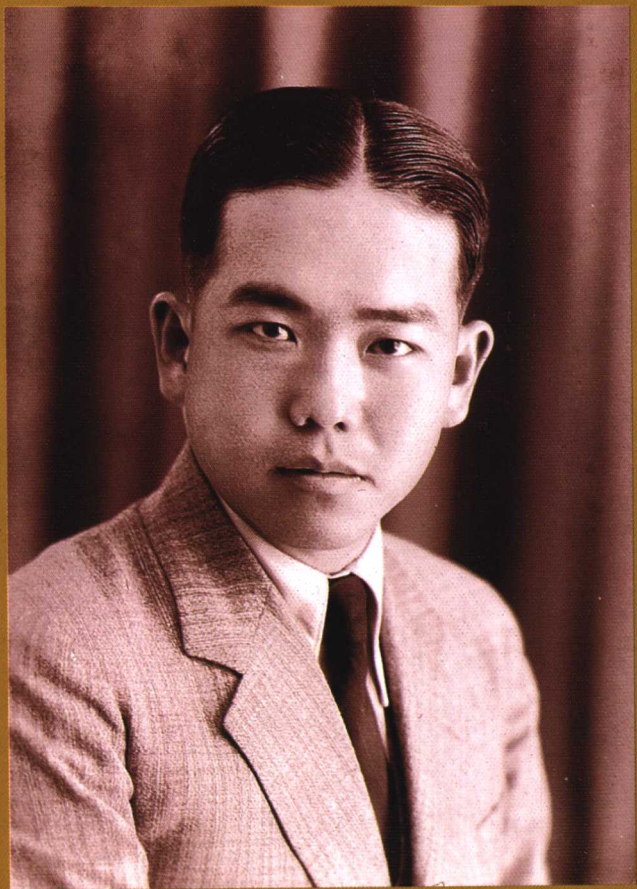
http://www.ecnupress.com.cn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印刷者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32开
印张 12.375
字数 346千字
版次 2004年9月第一版
印次 2004年9月第一次
印数 3100
书号 ISBN 7-5617-3662-2/I·291
定价 24.80元

出版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胡雲翼先生
(一九四六年于浙江嘉兴)



胡雲翼先生抗战前于湖南故乡



羽林少年行

韦嗣

駿馬牽來涇柳中
 鳴鞭欲向渭橋東
 征蹄
 踏春城雪
 花
 領嬌嘶
 上苑風

羽林王鏐



張為主客圖

河間紀昀集錄

馬端臨文獻通考唐詩主客圖一卷陳氏曰唐張為撰所謂主者白居易孟雲卿李益鮑溶孟郊武元衡各有標目餘有升堂及門入室之殊皆所謂客也近世詩派之作殆出於此要皆有未然者

計敏夫唐詩紀事為作詩人主客圖序曰若主人門下處其客者以法度一則也以白居易為廣大教化主上入室楊乘入室張祐羊士諤元

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卷第一



飲酒詩二十首 并引

予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
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
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
命故人書之以爲歡笑耳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
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
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相
歡持

郎夢後幾才人

燈花

影邊草就幾新詩
冷蕊踈紅剔更遲
正是秋涼無雁到
香閨處處卜天涯

蓼花

水國蕭疎吐晚芳
穗紅搖影媚秋光
蘆花應恨頭先白
拜倒斜陽未敢狂

剪春羅

寄情多在畫欄東
舊色嬌姿點綴工
一片輕羅猶未試
薄寒吹過剪刀風

素秋



綢繆千萬語
婉轉

十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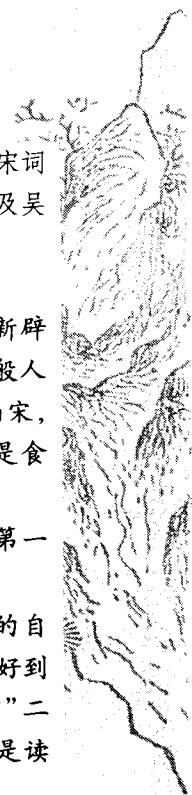
前 言

胡雲翼先生(1906—1965)以词学闻名于世,而实际上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早在湖北武昌高等师范学堂读书时,即与刘大杰、贺扬灵合称“武汉三才子”,以文学创作与古典文学研究露其头角,耀其才华,直至展其雲翼,可谓内美修能,名副其实(先生原名耀华,后改雲翼)。

先生对于中国文学有全面的了解,词学以外,所撰有《唐诗研究》(1930)、《新著中国文学史》(1932)、《宋诗研究》(1935)、《唐代的战争文学》(1937),而词学则是先生数十年寝馈其中,最具心得与特色,也是最有影响的学问。

先生的词学受王国维、梁启超、胡適三先生沾溉最深,王国维推崇北宋词、标举“境界说”;梁启超喜爱“奔迸”、“回荡”的辛弃疾词;胡適则赞美白话词,贬斥“词匠”词。读先生所著《宋词研究》(1925)、《词学ABC》(1930)、《中国词史略》(1933),我们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出其渊源所自。而在建国后出版的《〈宋词选〉前言》中,先生将明张綖、清王士禛以来分词体、词派为“婉约”、“豪放”的提法充类至尽,把“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之词定为主流,而把“代表南宋士大夫消极思想和个人享乐思想”之词定为逆流,并以此为标准对宋词作了评选,也正缘此,词学界尊体派一些学人在先生身后颇有微词。

“顺逆”之说用的是斗争哲学的术语,如今不免触目刺耳,想先生当时内心亦未必以此为然,不过以“左”的词藻加以文饰而已。但是,重“豪放”、轻“婉约”,却的确是先生平生一以贯之的词学思想。




《宋词研究》是先生的少作，也是词学史上第一部系统全面研究宋词的专著，问世早于刘毓盘《词史》（1930）五年、王易《词曲史》（1932）及吴梅《词学通论》（1932）七年。正是在这部著作中，先生指出：

据我们看来，苏轼一派的词，打破了词为艳科的狭义，开辟无穷的词境，让新作家去努力。革命的伟迹不小。无奈一般人只囿于词以婉约为宗，不向新境界图发展（苏轼以后直至南宋，才有辛弃疾继起），反肆意讥笑革命军，而刻意求古，这才是食古不化呢^①！

清真词之铺叙，未必高出淮海。居然有人称他是北宋第一词家，未免过誉了吧^②。

姜夔……即如他最有名的《暗香》、《疏影》，那是姜夔的自度腔，在词史是两首极有名的词。但在我们看来，也未见得好到怎样。艺术确是不差，典故也用得很巧，可以说得上“清空”二字。可是没有内容，没有情感，引不起读者心弦的感应，真是读了等于不读一样，这是坏的方面讲^③。

实在，宋末的词已经变到无可变了。所谓词家作词，也只是在旧词里面换字斟句，转来转去，并无新意，值不得我们加意来叙述^④。



这些观点是直至先生操《宋词选》（1962）选政时均未改变的。当然，变化还是有的，而且还是大的。如《宋词研究》认为将宋代词人分为豪放、婉约二派不妥，“辛弃疾、苏东坡有豪放的词，也有婉约的词，一切词人都是如此。在这里，我们既然不能说某一个词家属于某派，则这种分派便没有意义了”^⑤。这不由使我们想起了施蛰存、吴世昌二先生在“文革”后提出的同样的观点，原来先生早就智珠在握了，但是在《〈宋词选〉前言》里，却又分明标举以辛弃疾为首的豪放派与姜夔为首的婉约派的对立。又如在《宋词研究》、《词学概论》（初版原名《词学ABC》，收录于《ABC丛书》）、《中国词史略》、《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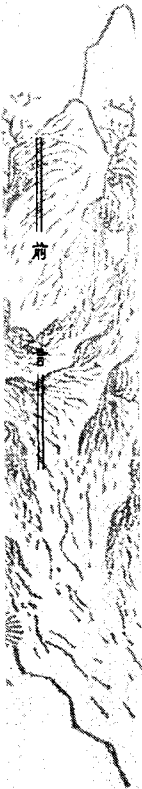



著中国文学史》中，先生对李清照、朱敦儒二家略无间言，而在《宋词选》中却不乏贬辞。他指摘易安《词论》否定诗词合流的形式主义倾向，言其词作“内容和诗歌所表现的爱国主义思想相形见绌”，“有不少的词在渲染愁情上尽其能事，难于确指其内涵的现实意义，而且情调过分低沉，这给读者不免要带来一些消极因素”^⑥。又批评朱氏《樵歌》“有很大一部分反映闲适的生活，严重地脱离现实”，“在思想感情里削掉了‘憎爱’，作品里便不会再有家国之感，剩下的便只有风月了”^⑦。前后异撰，其故何耶？想来必是和钱锺书先生作《宋诗选注》时那样，“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不得不然吧^⑧，实非出于先生本意。联想到拨乱反正后提出不同意见的词学研究者，他们在当时也只能噤不发声，不提异议，对此我们能够体谅，那么，对于同样是一介书生的雲翼先生，我们难道就不能用《春秋》的“原心”之法吗？

实际上，不但对于非出个人肺腑而迫于压力而发之言当原其心，对于实出其人本心之语亦当抱有同情的理解，即所谓“知人论世”是也。

先生重“豪放”、轻“婉约”词学观点的形成，是与他的时代和阅历密不可分的。先生少时目睹身经中国的积弱积贫、列强侵略，早萌救国复兴之志，曾亲身投入抗日战争。加上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痛时人之麻木，而产生改造国民性的强烈愿望。且听他在《唐代的战争文学》末尾所抒发的那一番慷慨激昂之言吧：

尤其现在的中国，我们能够非战吗？五卅惨案发生了，巡捕开枪击杀华人了，外国军舰已经包围上海了，日军乘机潜入南满了，帝国主义不断地向我们进攻，我们能够非战吗？江浙的战事未已，广东的战事未已，东北的战争又爆发了，鲁豫的战事又爆发了，土匪到处掠劫了，水深火热的内乱没有已时，我们能够非战吗？本来酷爱和平，已铸成中国人的特性，何待鼓吹非战？况且中华民族经过儒教、道教、佛学、理学等东方文化几千年不断的渲染，已经变成卑弱的、无抵抗的、亡国的国民性了。我们现在正应该鼓吹尚武奋勇的猛烈精神，唤醒伟大民族的灵魂，为正






义而作战，为民族的独立与自由而作战，为祖国的生存与福利而作战，为世界永久的和平而作战。我们所需要的，是革命的、主战的文学，我们应该反对卑怯的非战文学，反对那妨害国民性的鼓吹非战思想的文学^⑧。

在《词学概论》中，先生论苏轼词时又说：

我们则认定这种“别派”，是词体的新生命。这种新词体离开了百馀年来都是这样温柔绮靡的旧墟，而走上一条雄壮奔放的新路。这条路可以使我们鼓舞，可以使我们兴奋，而不是叫我们昏醉在红灯绿酒底下的“靡靡之音”^⑨。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明末陈子龙反对公安派的“韵趣”和竟陵派的“幽峭”，认为是一种“亡国之音”，而提倡雄浑高亮的前后七子之诗^⑩；又梁启超称赞陆游诗时所说的“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⑪。一古一今两位前辈，其议论与先生的逻辑若合符节。可见国难当头的形势使忧国之士对文章的风格舍婉约而取雄浑，乃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现在略谈一下本人对先生最负盛名的著述《宋词选》的看法。此选可与先生少作《词选》（亚细亚书局1933年版）的宋代部分相较。在其书序中，先生指出：

我认定朱祖谋先生的过于重视传统的古典主义，特别赏识吴文英一派的词，和胡适先生的惟白话是崇主义，专门赏识朱敦儒一派的词，都不是健全的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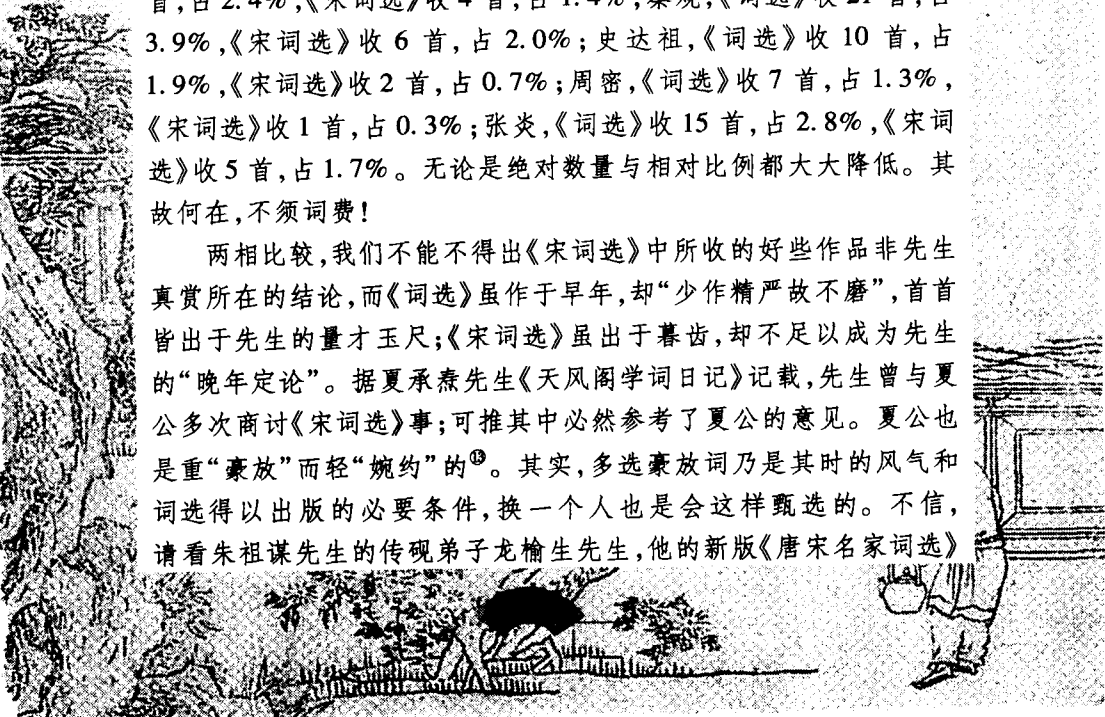
我认为吴文英固然有许多好词，亦未尝没有坏词；朱敦儒派固然有许多好词，亦未尝没有坏词。总之，任何作家的作品的好坏，决不能因其作风偏于古典或俚俗而加以整个的优或劣的批判。





这番话公允之极。我们注意到先生不唯权威马首是瞻，已不以胡通凡白话词皆好的观点为然了。据《词选》自序，该书所选之词，“都是我向来所喜欢诵读的精粹的作品”，可见足以代表先生的真实喜好。而《宋词选》中所选，就不免有受意识形态摆布的因素了。我们不妨将二选作一比较，看一看两者所收“豪放派”词与“婉约派”词数量上的消长。

《词选》收宋词 533 首，而《宋词选》收词 296 首，前者较后者多出 80%。先看“豪放派”：苏词，《词选》收 16 首，占 3.0%，《宋词选》收 23 首，占 7.8%；辛词，《词选》收 25 首，占 4.7%，《宋词选》收 40 首，占 14%；陈亮词，《词选》收 1 首，占 0.2%，《宋词选》收 4 首，占 1.4%；刘过词，《词选》收 4 首，占 0.8%，《宋词选》收 6 首，占 2.0%；张孝祥，《词选》收 4 首，占 0.8%，《宋词选》收 8 首，占 2.7%。无论是绝对数量与相对比例都大大提高。再看“婉约派”：晏殊，《词选》收 11 首，占 2.1%，《宋词选》收 5 首，占 1.7%；张先，《词选》收 15 首，占 2.8%，《宋词选》收 3 首，占 1.0%；晏几道，《词选》收 13 首，占 2.4%，《宋词选》收 4 首，占 1.4%；秦观，《词选》收 21 首，占 3.9%，《宋词选》收 6 首，占 2.0%；史达祖，《词选》收 10 首，占 1.9%，《宋词选》收 2 首，占 0.7%；周密，《词选》收 7 首，占 1.3%，《宋词选》收 1 首，占 0.3%；张炎，《词选》收 15 首，占 2.8%，《宋词选》收 5 首，占 1.7%。无论是绝对数量与相对比例都大大降低。其故何在，不须词费！



两相比较，我们不能不得出《宋词选》中所收的好些作品非先生真赏所在的结论，而《词选》虽作于早年，却“少作精严故不磨”，首首皆出于先生的量才玉尺；《宋词选》虽出于暮齿，却不足以成为先生的“晚年定论”。据夏承焘先生《天风阁学词日记》记载，先生曾与夏公多次商讨《宋词选》事；可推其中必然参考了夏公的意见。夏公也是重“豪放”而轻“婉约”的^⑤。其实，多选豪放词乃是其时的风气和词选得以出版的必要条件，换一个人也是会这样甄选的。不信，请看朱祖谋先生的传砚弟子龙榆生先生，他的新版《唐宋名家词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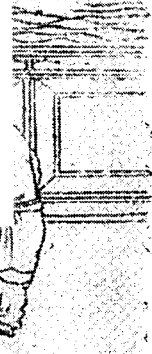
(1962)所收苏、辛词的数量不也居所选诸家之冠吗(开明书店民国二十三年版收吴文英词最多)?检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词选释》(1962),亦复如是。二书皆与《宋词选》同年问世。


不过,先生在《宋词选》中也有坚持己见之处。如姜夔词,《词选》收9首,占1.7%,《宋词选》却收10首,占3.3%。周邦彦词,《词选》收13首,占2.4%,《宋词选》收10首,而比例却占3.3%。吴文英词,《词选》收7首,占1.3%,《宋词选》虽仅收4首,而比例却也占1.3%。可见先生在《宋词选》序中所说其选“是以苏轼、辛弃疾为首的豪放派作为骨干,重点选录南宋爱国词人的优秀作品,同时也照顾到其他风格流派的代表作,藉以窥见宋词丰富多彩的全貌”之言为真实不虚。其书的可贵正在这里。

至于此选的注释,尽管不可避免有一些疏误,却发挥了别的选本做不到的“广大教化主”作用,因为先生对选本注释所悬的标准至为严格,即:一、注释词句,首先是要求讲得通、讲得准确贴切,能够说明问题。二、注释词句不仅要讲得通,还要进一步发掘其真正意义之所在,避免简单化。三、征引词句的来源,取其语言艺术上具有相承相因或者推陈出新的关系,不是说一般的习用词语,都必须找出它的根源^⑧。深入浅出,繁简适中,这一切都甚便初学,无疑是此选能够风行海内、一印再印的原因所在。

正因为如此,作为先生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宋词选》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至少它在那严酷的政治条件下,以“左”的言词为掩护,巧妙地向广大古典文学爱好者普及了绚丽多彩的宋词。不能不承认,许多当代的词学专家,正是受此书启蒙而走上研究词学之路的。可惜其中有一些人如今已不肯原先生之心,反而“蠹生于桂而还食其桂”了。我真希望他们学一学作《非〈国语〉》的柳宗元,不一笔抹煞《国语》的好处,而能说出“参之《国语》以博其趣”那样的持平之论来。


综而述之,先生的词学思想孕育发展于多难之邦,以忧国之心,挥谈词之麈,于前贤既有所继承,有所扬弃,既应和了当时的文艺思潮,又起了保存遗产不使湮灭的积极作用。其中虽不无偏激之处





(如宣称“词体在百年前便死了”，反对现代人填词之类)^⑤，却也绝不致如某些论者所说那样“容易贻误青年”。谁都明白，偏激之源别有所在，时代变迁，公论自见，旧有的过与不及自消。试看今日，年轻的诗词爱好者各就性之所近，于词或爱豪放，或喜婉约，不见得是受了谁的贻误；词学研究者也各就己之所长，或论风格，或重体制，或微观着手，或宏观着眼，我用我法，卿用卿法，也并不曾受先生词学思想的束缚。倒是那些“人人自以为握灵蛇之珠，家家自以为抱荆山之玉”的予智自雄现象值得忧虑。毕竟，我们对前辈的学术成果应当抱尊重的态度，因为这些成果是他们生命所寄、心血所凝，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对胡雲翼先生的词学研究，我们正应作如是观。


下面再谈谈对先生诗学与文学史著作的看法。




《唐诗研究》是一部颇有见地的著作。先生纠正了流俗认为唐诗是最好、最盛的说法，指出“古诗如《古诗十九首》、《孔雀东南飞》，无论怎样丧心病狂的人，也不能不说是好诗，不能说其价值在唐诗之下”，《全唐诗》中，“实在有多少不是好诗，或竟不成诗”^⑥。若以诗人数量而论，后世列朝也每每超过唐代^⑦。唐诗的伟大乃在于“创造的”、“音乐的”、“通俗的”和“时代的”，这些特点都集中反映在新体诗上^⑧。唐诗初盛中晚并不是由盛趋衰，而是各有佳处^⑨。这些皆是持平之论。


先生论诗，持“文学进化”和“平民文学”两大基本观念^⑩，这两大观念贯串于先生所有的文学研究著作之中。细加考察，则先生所说的进化，是从全局的、通盘的意义上来看的，即文学创作，作为整体是进化的，而就每一种特定的文体而言，先生则认为发展至顶峰后又必然退化了，如先生所言今日旧诗词已是死文学之类的看法即是如此（至于先生潜意识中是否如此认为另当别论，因为先生还分明著有旧体诗集《废笔吟》），可见先生受“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点影响之深，而这一观点显然又是从“平民文学”这一观念生发出来的。

不过，先生将诗的消亡之期似乎定得较晚。他说，“理论上，宋






代已经不是诗的时代了,但是,却不能说没有宋诗”^②,”宋诗也决不是离开了唐便失去了意义的”^③。为此,他作了《宋诗研究》一书。但书中对宋诗特点的概括,却是处处以唐诗为参照物的,且流露出无限惋惜之情:“宋诗消失唐代那种悲壮的边塞派的作风了”,“宋诗消失唐代那种感伤的社会派的作风了”,“宋诗消失唐代那种哀艳的闺怨诗的作风了”,“宋诗消失唐代那种缠绵活泼的情诗的作风了”^④,”消失”的,无疑正是先生所深爱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指出了宋诗“整练”、“细致”、“冲澹”,没有唐人“不工稳”、“粗率”、“一味豪迈意气”之病的特点^⑤。“恶而能知其善”,这是值得称道的。此书的缺陷是对诗派的划分未能细密,如将江湖派诗人列入反江西派之类^⑥。其实,严格讲起来,江湖诗人风格多样,未足成派,其中甚至尚有坚持江西派诗风的。不过,草路蓝缕,自不免有粗疏之处,这就有望于来者的“后出转精”了。



先生的《明清诗选》(1940)也是一部颇有意味的选本,因为依照先生之意,明清早已是诗的死亡期了,但他在此书的序中却说“诗的发展,至明清已成馀韵”。改为“馀韵”,则其时之诗犹“生”而未“死”,这样,便有可选的理由了。当然也不能多选,此书于明代仅收十三家,选得最多的是高启(六首)、袁宏道(七首)。重“高”是遵从传统(《四库提要》谓高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而重“袁”则是受时代影响而然(周作人、林语堂等皆提倡公安派)。于清则仅录二十一家,选得最多的是吴伟业(17首)、王士禛(13首)、袁枚(10首)、蒋士铨(16首)、赵翼(15首)、黄景仁(26首)。从所录黄诗居全书之首来看,已透露出先生的真正赏心所在,亦可见乃师郁达夫先生的巨大影响。



至于先生的《新著中国文学史》,从其内容结构来说,自亦是“吾道一以贯之”之作。于历代正统文学仅在综述中概而论之,甚至一笔带过,而对“大众文学”则娓娓细说。如于唐则详于诗歌,于宋则详于歌词,于元则详于戏曲,于明则详于戏曲小说,于清亦然。“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在书中得到了彻底的贯彻,这个框架为